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当代中国学术史系列



当代中国拉丁美洲研究

STUDY O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CONTEMPORARY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当代中国学术史系列



当代中国拉丁美洲研究

STUDY O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CONTEMPORARY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拉丁美洲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编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6

ISBN 978 - 7 - 5161 - 9261 - 0

I. ①当… II. ①中… III. ①拉丁美洲—研究 IV. ①D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650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林
特约编辑 文一鸥
责任校对 周昊
责任印制 戴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2
字 数 269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伟光

副主任 蔡 昉（常务） 李培林 李 扬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宪群	马 援	王 国 刚	王 建 朗	王 巍	邢 广 程
刘丹青	杨 光	李 平	李 汉 林	李 向 阳	李 林
李 周	李 培 林	李 薇	吴 恩 远	张 宇 燕	张 顺 洪
陆 建 德	陈 众 议	陈 泽 宪	卓 新 平	周 弘	郑 秉 文
房 宁	赵 剑 英	郝 时 远	唐 缙 军	黄 平	黄 群 慧
朝 戈 金	程 恩 富	谢 地 坤	蔡 昉	裴 长 洪	潘 家 华

总策划 赵剑英

《当代中国拉丁美洲研究》

编辑委员会

课题审读及顾问专家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 苏振兴 张森根 曾昭耀 袁东振
贺双荣 刘维广 房连泉

对外经贸大学： 赵雪梅

北京外国语大学： 常福良

课题组负责人及主编 柴 瑜

课题组成员 魏 然 李 慧 李 茜 芦思姮
何露杨 王 帅 高 涵

总序

当今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变动之中，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和改革开放的攻坚期。这一切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大繁荣大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目前面对三大有利条件：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界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广阔舞台，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素材。二是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三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实施，为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思想创造和理论创新营造了良好环境。

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体系建设，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工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响应这一号召，启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工程，旨在努力实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学术观点与理论创新、学科体系创新、科研组织与管理创新、科研方法与手段创新、用人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体系创新。实施创新工程的目的是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体系，不断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多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精品成果，多出政治方向正确、学术导向明确、科研成果突出的高层次人才，为人民服务，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明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实施创新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完善学科建设机制，优化学科结构，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结构合理、优势突出、适应国家需要的学科布局。作为创新工程精品成果的展示平台，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的撰写，对于准确把握学科前沿发展状况、积极推进学科建设和创新来说，是一项兼具基础性和长远性的重要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伴随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历史，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也处在形成和发展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各学科的研究

不断拓展与深化，成就显著、举世瞩目。为了促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观念、方法和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更主动地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扩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增强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我们亟待梳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思想的发展轨迹，不断总结各学科积累的优秀成果，包括重大学术观点的提出及影响、重要学术流派的形成与演变、重要学术著作与文献的撰著与出版、重要学术代表人物的涌现与成长等。为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组织编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大型连续出版丛书，既是学术界和出版界的盛事，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分为三个子系列：“当代中国学术史”“学科前沿研究报告”和“学科年度综述”。“当代中国学术史”涉及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民族学、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语言学等不同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内容丰富，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状况。“学科前沿研究报告”按一级学科分类，每三年发布，“学科年度综述”为内部出版物。“学科前沿研究报告”内容包括学科发展的总体状况，三年来国内外学科前沿动态、最新理论观点与方法、重大理论创新与热点问题，国内外学科前沿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学科年度综述”内容包括本年度国内外学科发展最新动态、重要理论观点与方法、热点问题，代表性学者及代表作。每部学科发展报告都应当是反映当代重要学科学术思想发展、演变脉络的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性成果；都应当是作者长期以来对学科跟踪研究的辛勤结晶；都应当反映学科最新发展动态，准确把握学科前沿，引领学科发展方向。我们相信，该出版工程的实施必将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该系列丛书也将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领域重要的史料文献和教学材料，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学事业以及人才培养作出重要贡献。

王伟光

序　　言

拉美距中国万里之遥，但中拉之间的相互往来却历史悠久。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中国对拉美的系统性关注和研究树立了优良的学术传统与传承，成果丰硕。伴随着学界前辈们的辛勤耕耘和新一代学人的不懈努力，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拉美研究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新机遇。

中国拉美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中拉关系的发展和中国自身的发展进程密切联系，是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理论与实践的建设性补充。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冷战格局之中，随着与古巴建交，中国对拉美的研究有了更明确的意识形态的指向。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破冰之后，一些拉美国家开始与中国建交，更多的拉美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发展受到关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各领域的情况与变化成为研究的主要内容。中国启动改革开放进程是中拉关系发展的新起点。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区域化趋势为拉美自身及中拉关系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作为发展经济学思想与案例的重要来源之一，拉美经济发展模式及经济增长的跌宕起伏、工业化过程的艰难求索、对外经贸合作的潜力与方向、拉美经济改革与市场环境变化趋势等成为研究的新关键。随着中拉经贸往来的迅速增多，拉美在中国能源资源、农产品等需求中地位凸显，中拉经贸关系成为研究热点。同时，作为比较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对于拉美政治思潮、政治发展、政党政治、可治理性，以及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的观察与思考不仅引导和深化了对拉美地区政治体制的认识，也为中拉关系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研究的新维度。当前，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都面临着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拉美在谋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努力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对拉美区域的针对性研究不仅丰富了中国拉美研究的内涵，而且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的拉美研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为鲜明的研究传统与特色，产生了大量为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外交事业作出积极贡献的研究成果。这与学界前辈们呕心沥血的艰苦努力分不开。记得苏振兴学部委员曾讲起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促进拉美经济学科的发展，他们诚挚邀请国内世界经济学界的名家来所授课、交流。精心裁下的学术之树，经过多年的浇灌、施肥、修枝，才能够发芽、开花、结果，一代代人的辛勤汗水都写在丰硕果实的笑靥上。

前辈的创造与奉献对我们是无言的榜样和鞭策。目前呈现的这本书是中国社科院拉美所一些年轻学者对中国拉美研究历程的观察与思考。他们满怀着对拉美研究的热情，受过良好的学科训练，具有语言优势，而且勤于思考、勇于创新，代表着中国拉美研究的未来一代。

中国拉美研究学科是中国拉美学界共同耕耘的精神家园。中国拉美研究发展的每一步都留下了中国社科院拉美所与其他高校和机构拉美研究部门并肩奋斗的足迹。在本书成书过程中，他们也分享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和写作建议。最后一章将介绍一些拉美机构和学人，但实际上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这里特向为中国拉美研究事业做出贡献的各界人士致敬！

感谢在本课题立项之初时任拉美所所长的郑秉文研究员对课题组的信任、支持与督促。

感谢苏振兴、张森根、曾昭耀等教授的悉心指导。感谢苏振兴、袁东振、贺双荣、刘维广、房连泉、赵雪梅（对外经贸大学）、常福良（北京外国语大学）等诸位教授和专家，他们认真审阅了本书全稿，并提出了中肯而宝贵的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课题组进行了多轮仔细修改和完善。

感谢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吴白乙所长、王立峰书记对本课题的大力支持。感谢刘东山老师在课题协调和出版组织方面付出的努力。

限于水平，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柴 瑜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
2016年3月14日

目 录

第一章 国际拉美研究的建立及其与中国拉美研究的关系	(1)
第一节 国际拉丁美洲研究的建立	(1)
第二节 现代化理论与中国拉美研究的兴起	(8)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拉美研究	(13)
第二章 拉美政治研究	(18)
第一节 拉美政治学科的创建与发展	(18)
第二节 拉美政治思潮研究	(22)
第三节 拉美政治发展研究	(27)
第四节 拉美左派研究	(37)
第五节 拉美国家政治制度研究	(41)
第六节 拉美国家的政党和政党政治研究	(48)
第七节 拉美国家可治理性研究	(55)
第三章 拉美经济研究	(59)
第一节 拉美经济学科的创建与发展特征	(59)
第二节 拉美经济发展理论与思潮研究	(65)
第三节 经济发展模式与发展战略研究	(73)
第四节 经济危机	(82)
第五节 经济改革	(89)
第六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世界市场研究	(97)
第七节 拉美经济专题研究	(108)

第四章 拉美国际关系研究	(114)
第一节 拉美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	(114)
第二节 拉美国际关系理论	(120)
第三节 拉美对外关系及外交政策研究	(125)
第四节 拉美地区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研究	(143)
第五节 拉美地区组织研究	(147)
第六节 拉美与全球治理	(156)
第七节 中拉关系研究	(161)
第五章 拉美社会文化研究	(173)
第一节 拉美社会文化学科的发展	(173)
第二节 拉美城市化问题研究	(178)
第三节 拉美收入分配及贫困化研究	(182)
第四节 拉美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187)
第五节 拉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	(194)
第六节 拉美文化研究	(200)
第六章 中国主要拉美研究机构的演变	(211)
附录	(229)

第一章

国际拉美研究的建立及其与 中国拉美研究的关系^①

第一节 国际拉丁美洲研究的建立

一 定义拉美研究

作为现代学科的拉丁美洲研究，是一门旨在研究与拉美国家和拉丁美洲人相关的各种现象与问题的学科，是区域研究的一个分支，西班牙语表达为 *Estudios latinoamericanos*，英文为 *Latin American Studies*，缩写为 LAS。正如现代其他区域研究学科一样，拉美研究是一门跨越传统知识门类的交叉新学科。以世界上参与人数最多的拉美研究学术组织——美国的拉丁美洲研究协会（Latin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为例，其中不仅包含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人文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国际关系学等传统学科，甚至也囊括媒体研究、性别研究、城市规划等新兴学科分支。这一跨学科特征决定了拉丁美洲研究势必囊括了多种研究视角，能够同时调动多角度、多层面的学术分析工具。鉴于“拉丁美洲”本身就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概念^②，因此拉美研究也呈现出开放性的特征，不断借鉴、吸收与之相关的研究亚门类，如拉丁裔研究（Latino Studies）、跨大西洋研究等等。

① 本章第一、二节执笔：魏然，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助理研究员。

② “拉丁美洲”是一个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命名，因此不能完全依照地缘位置来判定，譬如古巴被认为是重要的拉丁美洲国家，而地理位置接近的加勒比英语国家与大陆西、葡语国家的关系就较为松散；又如身处美国的奇卡诺人群，仍旧与墨西哥、中美洲保持密切关系，因此有学者主张应将其纳入拉美研究的范畴。

实际上，现代拉美研究出现之前，关于拉丁美洲的论著已颇为丰富。譬如德国科学家、博物学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就曾出版过与拉美区域地理、经济与地缘政治相关的大量著述，早期的拉美本土学者和重要作家，如委内瑞拉政治家、文学家安德烈斯·贝略（Andrés Bello）、古巴革命家何塞·马蒂（José Martí）、乌拉圭思想家何塞·恩里克·罗多（José Enrique Rodó），都曾对拉美进行理论性思考，并留下了研究拉丁美洲的基础性文献。然而，这些研究与著述尚不能被称为“现代拉美研究”。实际上，“拉丁美洲学”（Latin Americanism）一词，直到20世纪才被广泛使用，而且主要出现在欧美学人的表述中。因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所讨论的“拉美研究”并非指涉所有谈论拉丁美洲的著述，而是特指作为现代学科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分支的拉丁美洲研究。

根据阿尔瓦雷斯（Sonia Álvarez）和阿里亚斯（Arturo Arias）等人的研究，作为区域研究之一的拉美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初，但狭义的拉美研究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冷战是国际拉美研究诞生的大背景。50年代美国的拉美研究曾是区域研究中资金最雄厚、人员最齐备的分支学科。^①冷战之后的90年代，失去了政府和基金会的支持，拉美研究曾一度遭遇危机；美国学界曾展开广泛讨论，有学者认为包括拉美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理应消失。但20年之后，由于拉丁美洲表现出的发展活力和历史文化魅力，加之区域研究学科的自我更新，主张取消这一学科的呼声消失了，拉美研究蒸蒸日上，日益成为国际研究中的显学。

二 海外拉美研究的兴起

虽然区域研究全面勃兴发生在二战之后，但实际上，美国拉美研究的源头（特别是加勒比研究）始于美西战争。美西战争之后，美国迫切需要加强对前西班牙殖民地古巴的了解。杜兰大学的罗杰·泰勒·斯通中心（Roger Thayer Stone Center）是美国最悠久的研究机构，该中心建于1924年，是学科发展的历史象征。美国第一个拉美研究

^① Sonia Alvarez, Arturo Arias and Charles Hale, “Re-visioning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26, Issue 2, pp. 225—246.

中心出现在杜兰大学绝不是偶然，因为大学的赞助人泽穆雷（Samuel Zemurray）就是著名的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的总裁。^① 正是在泽穆雷的扶持下，杜兰大学建立了中美洲研究系，并最早建立了大型专门图书馆和中美洲考古陈列馆。随着美国和拉美的经济依附关系的深化，1931年，佛罗里达大学也建立了拉美研究中心；1940年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建立了拉美研究所，该所目前仍是美国国内最大的拉美研究实体机构。

二战后，在美国及西方学术界，跨学科的区域研究一度成为显学。原本在战前，美国仅有少数大学设有教授非西方国家现状的课程；战后，为了应对来自苏联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挑战，处理亚洲、非洲普遍爆发的去殖民运动（Decolonial Movement），洛克菲勒基金和福特基金等重要学术资助方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提出美国需要投资国际研究的设想。参加讨论者大都认为，美国需要培养大批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学家和经济研究专家，由他们组成资政的智库，服务于美国在海外的利益。^②

福特基金会是主张在美国发展区域研究专业的主要推手。^③ 1950年，基金会设立了优厚的区域研究奖学金（FAFP），从1953年到1966年，共计向34所大学的区域研究和外语研究院系提供了2.7亿美元

^① 泽穆雷（1877—1961）是俄裔美国商人，绰号“香蕉人山姆”，他和联合果品公司在中美洲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譬如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为止，联合果品公司拥有危地马拉70%的私有土地，但只有15%的土地被用于种植农作物，其他土地被囤积起来，预备种植经济作物。阿本斯总统执政后，签署了一项征用撂荒土地的法令，这一情况促发中情局和泽穆雷联手在1954年策动政变，推翻阿本斯政权。联合果品公司的恶名早已随着《百年孤独》而为世人所知，几乎成了经济剥削的代名词。关于泽穆雷与中美洲政治及杜兰大学的关系，可参见 Rich Cohen, *The Fish That Ate the Whale: The Life and Times of America's Banana King*,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② 但对于如何组成资政智库，基金会和学界也有不同设想：有人认为不仅应该推广西方模式，社会科学家也应该注重世界各个地方历史化的知识，了解不同本土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这就要求社会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紧密合作。但也有呼声，主张发展一种宏观历史性的理论，以之涵盖不同地域下不同国家的各个发展阶段。前者就导向了区域研究，后者则导向了现代化理论。

^③ 参见 Ellen Condilffe Lagemann,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The Carnegie Corporation, Philanthropy, and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的资助。^① 正如其他区域研究学科一样，拉美研究也在此时获得政府的大力扶持。

紧随福特基金会的倡议，1957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案（Title VI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NDEA），通过全国资源中心项目（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programs）的名义，向 125 个大学区域研究机构提供资金，也直接为外语和区域研究的研究生提供奖学金。1965 年这一法案更名为高等教育法案（Higher Education Act）。在英国，1965 年的“佩里报告”（Parry Report）起到了类似的效果。自此，英国国家与私营部门也自愿兴建了一大批拉美研究中心或院系。^②

50、60 年代，区域研究兴盛一时，各种研究中心纷纷成立，描述这一表象之后，我们还应分析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即发展话语的形成。20 世纪 40、50 年代，西方主流社会开始推崇这样的信念，即“无论以怎样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成本为代价，现代化是唯一能够摧毁陈旧的迷信的、必然的进步之路。只有通过物质的发展，才能实现社会、文化和政治的进步。”^③ 发展与资本形成过程又需要多种因素，如技术、人口与资源、货币与财政政策、工业化与农业发展、商业与贸易等。此外，还涉及教育和培养现代文化价值观的工作。我们不应忘记，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于 20 世纪 40 年代，联合国也在此时成立了众多专业机构，其中就包括总部设在智利的联合国拉美经委会（CEPAL）；其后，60 年代在美国进步联盟（Alliance for Progress）的推动下，众多拉美国家针对这些要素成立了一批国家规划机构。阿图罗·埃斯科瓦尔提醒我们，上述要素本身并无太大新意，新的情况在于“发展是这些要素、机构和实践之间建立了关系后的结果，是将这些关系系统化为一个整体的结果。由于这些关系，构成发

^① David L. Szanton, “The Origin, Nature and Challeng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ed. David L. Szant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② Bulmer-Thomas, ed., *Thirty Years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965—1995*, London: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1997.

^③ 阿图罗·埃斯科瓦尔：《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汪淳玉等译，叶敬忠译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3 页。

展话语的不是它范畴内可能存在事物的罗列，而是一种方式。”^① 发展话语对这些要素进行分组安排，并赋予它们总体性。而建立体系的过程，也就是为游戏制定规则的过程：谁拥有发言权，从哪些角度发言，根据什么专业标准来判断等等。简言之，发展话语造成了发展的专业化。

还有几个概念与区域研究的形成关系密切，其中就包括“欠发达”和“第三世界”这两个关键词。伴随着“欠发达”和“第三世界”等发展主义概念的提出，西方学界重建了与世界其他地域（主要是亚非拉），“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关系，这种逻辑是区域研究形成的基础。正是由于这种新观念，原本不相干的传统学科（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外国语言文学等）才可能聚合在一起，训练研究第三世界的专业人员。

如果说 1957 年国防教育法案的颁布，保障了美国政府对于拉美学科的资金支持，那么来自拉美的政治动向才是刺激研究者灵感的源头。1959 年古巴革命胜利对于西方的激进知识分子和保守主义者都带来了深刻的刺激。实际上，20 世纪 60 年代整个拉丁美洲都处在政治亢奋状态，人们普遍相信古巴革命的热浪将席卷整个地区，带来剧烈的社会变革。正是在这种判断的激励下，许多顶尖学人将自己的专业划定在拉美研究。1968 年的学生运动激励美国激进大学生前往拉美革命现场，同时 60 年代美国科研经费相对宽裕，也为一大批研究生前往拉美做田野调查提供了经费。可以说，60 年代出现了第一次美国大学研究生前往“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浪潮。其中一批人经由这些经验，完成了思想上的“左倾”化或激进化。这批学院左派在 70 年代后开始了他们的学者生涯，早年的经历使他们普遍支持西半球的底层运动和左翼政治，并经常以学术或言论的方式，对抗美国政府的某些对拉政策。

三 后冷战时代拉美研究的危机与转型

实际上，自学科创立之初，包括拉美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就受到诟

^① 同上书，第 44—45 页。

病，批判之声甚至来自研究者内部。人们指责区域研究与冷战关系甚密，实际上分担了 CIA 或 FBI 等军情部门的任务，研究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国家情报人员。^① 就某种层面而言，美国拉美研究的学科设置就是以美国的全球霸权为依托的，其研究难免落入“拉美提供经验、第一世界学院提供理论”的窠臼与循环，冷战时代的拉美研究也难以抹去帝国管制的色彩。因此批评者认为，鉴于其设立初衷，区域研究难免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优先考虑，这就限制了学科的思考空间。^②

但对拉美研究更大的打击来自整体学术氛围的变化。东欧剧变之后，慈善基金会和科研机构普遍削减了对区域研究的支持，转而强调跨区域的课题，如“发展与民主”等等。原先美国政府资助区域研究的实际动力是防范美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共产主义化”，但冷战结束后，实际威胁已经消失。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和美国学会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进行大规模的学科调整，关闭了相当数量的区域研究单位，这也意味着国际研究的整体气候发生了变化。

伴随着 1989 年柏林墙的倒塌，冷战体系解体，原先以发展主义为基本逻辑的拉美研究，已经不符合后冷战时代的需求。同时，全球化的深入，后现代思潮的冲击，笼统地以区域（包括 33 个国家的拉丁美洲）为对象的研究也受到了性别研究、媒体研究等新学科的诟病。区域研究在 20 世纪 60—80 年代都无法成功地嵌入传统大学的教学框架，遭遇后冷战的新情况之后，学科合法性的问题立刻显现出来，研究者和教师纷纷回到自己原属的传统专业。新自由主义大学改革的浪潮，造成专业教育要为商业市场服务，区域研究只能谋求转型，从政府以外的其他渠道寻找资助。

面对冷战到后冷战的转变，当代的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拉美研究所

^① 参见 Bruce Cumings, “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i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9, 1997. <http://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cumings2.htm>。

^② 此外，政治学和经济学当中兴起的理性选择理论，是区域研究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和日本政策研究所的前主席查尔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的话来说，那便是“假如通过理性选择理论可以预判日本政客和官员的行为，那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呢？” Chalmers Johnson and E. B. Keehn, “A Disaster in the Making: Rational Choice and Asian Studies,” *The National Interest* 36, 1994, pp. 14–22.